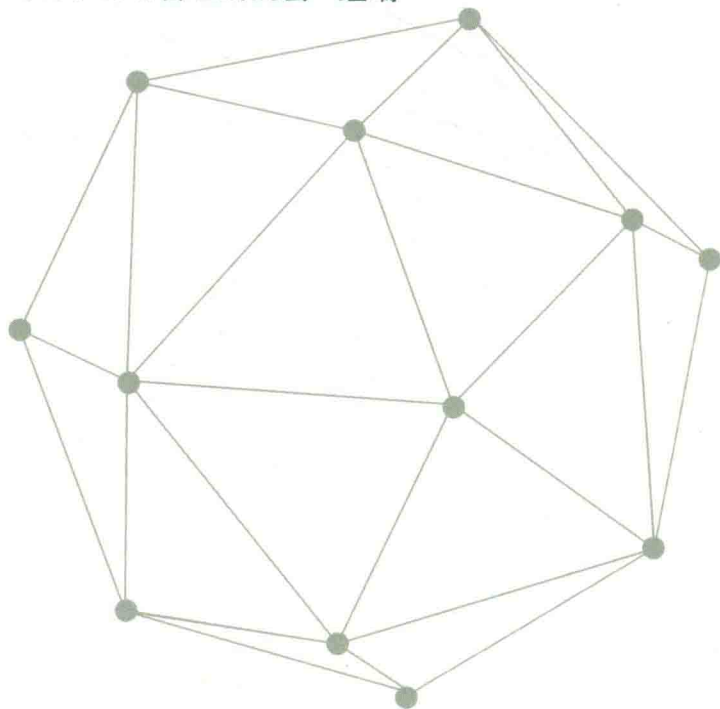


发挥高校优势 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组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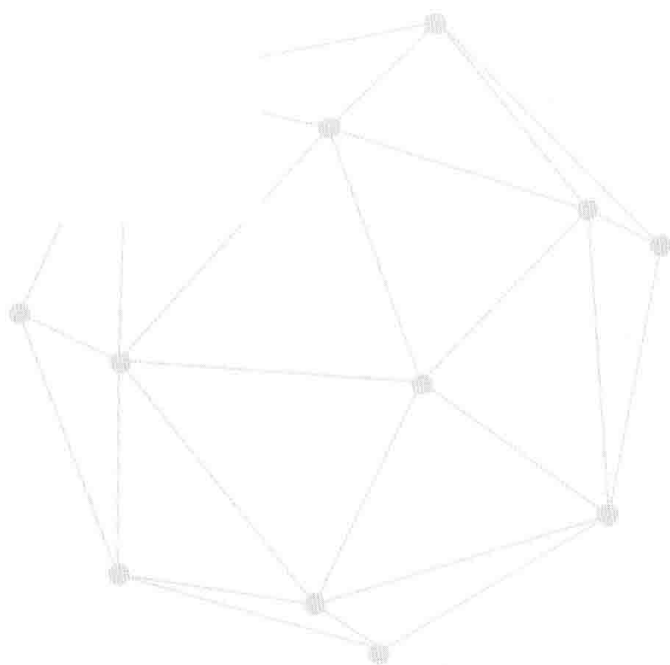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发挥高校优势 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组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挥高校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组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307-20350-1

I. 发… II. 全… III.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研究—中国
IV. 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5587 号

责任编辑:黄金涛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9.75 字数:28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350-1 定价:12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 2017 年年度工作会议的研讨主题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把握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发挥高校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确定这一研讨主题，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

本次年度工作会议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指导下，由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主办。本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在广西大学举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广西大学副校长范祚军等知名学者作了主题演讲，他们从理论、方法、经验、实现路径等方面对如何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本次会议主题学术研讨的成果汇编，以《发挥高校优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题结集出版。这些研究或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理论内涵与现状分析方面进行积极探讨，或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评价制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发展等方面深入阐述，或从各高校实践出发，对如何具体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因篇幅所限，还有部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未能编入，敬请相关作者谅解。

在本成果的组编过程中，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领导给予了精心指导，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秘书、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究院曾彦同志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

2018年4月

目 录

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1
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创业者一样劳作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十年发展	17
东盟研究、聚焦一流、协同创新	27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	3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地位的三个抓手	40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前提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48
高等学校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指导地位	59
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69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四个维度	79
改进高校科研评价之浅见	85
中外科研评估比较研究	93
韩国国立大学教师业绩评价制度的比较研究.....	100
完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与挑战.....	127
大学科研评价体系创新逻辑与改革建议	
——基于学术失范的视角.....	137
英美高校社会科学教师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比较研究.....	156

高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区别于西方智库的新特点与 新观念.....	176
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分析.....	181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科研管理队伍的职业倦怠研究	190
学术生产力格局的畸形及其矫正 ——以法学为样本的解读.....	203
全面推进“双一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 的学科.....	225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路径研究 ——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例.....	235
十八大以来武汉大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推进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发展.....	253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的完善路径 ——基于成果产出情况的分析.....	260
创新高校社科规划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基于厦门大学实践的分析.....	269
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工作探索.....	280
聚焦团队协作创新 助力青年人才成长.....	288
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同行评议局限性及改进策略研究.....	299

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吴晓明*

对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一种意义重大的反省性自觉正在逐渐生成。这种发展起来的反省最为切近地牵涉到中国学术的自我理解，亦即牵涉中国学术对于自身之当下处境和总体性质的基本判断：它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是自我主张的，还是依仗外部权威的？虽说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深深地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但它在理论上无疑将直接成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日益关切并不断经受考验的重大问题。



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经历，而任何一种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从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这里所谓的自我主张或自律性要求，意味着某种学术批判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意味着它是“自我—授权”的。很明显，只有当一种学术已然摆脱了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时，这种学术才开始达于其成熟阶段；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一种学术坚定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时，这种学术所取得的成果才从实质上来说是本己的，并因而才能成为伟大的。

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儿的“我思”开始。这一决定性的开端意味着什么呢？它无非意味着：哲学摆脱了它对哲理神学的依傍，而

* 吴晓明，复旦大学。

使思维——理性的思维——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黑格尔因此把笛卡儿称作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人物。笛卡儿的原则是思维，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近代哲学正是从这一根本之点上，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并开辟出它的繁盛时期。与中世纪的哲理神学不同，近代哲学把从自身出发的思维（内在性本身）当作最基本的立脚点，从而“抛弃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因此，“从笛卡儿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①。与此相类似，19世纪末的历史哲学运动力图使“历史科学”摆脱它对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从而要求成为自律的、自我主张的学术体系。这种自我主张意味着：“历史思想是不受自然科学统治的，而且是一种自律的科学。”^②按照柯林伍德的说法，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显然一开始在基本立场和方法上依赖于并模仿着她的“长姐”（即自然科学），并长期处于一种明显的“学徒状态”。唯当所谓历史批判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学家对“过去”唯一可能的知识乃是转手的或推论的（绝不是经验的），而这种转手性的知识也不能由经验来证实或实现时，史学理论方始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这一转折被称之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那就是发现，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而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③

就不同民族的学术发展和学术成果而言，情形同样如此。在某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任何一个民族之充满活力并能取得伟大成果的文化建构及其学术，只要它遭遇到足够强大的外来影响或冲击，都一方面表明它具有充分的容受性并因而能够积极地对外学习，另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9-63页。

②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页。

③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并参看第269页、第319页。

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必然表明它在发展进程中有能力获得其最坚决的自我主张。就此而言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希腊文化。尼采曾这样描述道:在很长的时间内,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倒了。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等,而他们的宗教则仿佛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希腊文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机械的混合物或一种“装饰性文化”,因为希腊人听从了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坚定而诚实地反省了自己真正的需要,换言之,希腊人终于取得了其文化上的自我主张。“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①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谈论某一民族之文化和学术的自我主张并强调其意义时,决不意味着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孤立主义或民族主义。事实上,一个伟大的文明及其恒久的学术,虽说必有其独特的起源和传统,但往往都经历与其他世界历史民族的接触,并将自身置于“文化结合”的锻炼之中。所以黑格尔在谈到“希腊世界”时说,虽说希腊民族的来源和它的语言学的特质可以追溯到其他民族(甚至追溯到印度),但是“精神”之真实的再生,却首先要在希腊寻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腊人一方面具有自己原有的文化,另一方面又面对东方世界的外来文化;正是通过这两重文化之结合的艰苦锻炼,才产生其“现实的和正当的活力”,并开辟出它的“胜利和繁荣的时期”。^② 这一过程的真正核心是希腊民族取得其文化上和学术上的自我主张。唯因其具备了这样的自我主张,所谓文化结合才显示其积极的和原创的意义来。世界史上真正伟大的复兴运动都必然是一个自我主张的原创性的胜利,而不是单纯的容受性。如卡西尔所说,文化精神史上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探寻自主性和容受性这两个方面如何彼此交织并

①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9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页。

相互决定。^①

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一方面背负着自己过去的遗产，另一方面也面对着、容受着各种外来的学说、思想和观念。就其基本的潮流和趋势而言，中国的学术是普遍地进入一种“学徒状态”中去了，并由此而开展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和内容丰富的学习进程。这一学习进程是如此地波澜壮阔和激动人心，以至于我们对它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学徒状态中，中国学术的对外学习从根本上来说也始终伴随着一种紧张的思虑，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枢轴的思虑；它深刻地出现在近代以来中国人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采取追问的形式，还是采取争论的形式。这种情形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学术不能不处于所谓“文化结合”的锻炼之中，即便是最诚挚最虚心的对外学习，也不可能趋避于这种锻炼的艰难困苦。无论如何，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决不是无谓的，由之而来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酝酿，也就是说，可能成为一种成果丰硕的积累；但其根本的前提是，中国学术必须在其发展进程中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并从而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就形式方面而言，学术之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标记首先牵涉到语言现象。因为学术从本质上来说采取思想的形式，而思想总是为一定的民族精神所规模，并植根于这一民族之“活的语言”中。威廉·冯·洪堡特曾深刻地指证了语言在整个民族生活中的奠基作用：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呼吸”，它和民族精神是高度同一的；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有机体”，并具有不同的从内部进行创造的原则——每一语言的内在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②因此，学术在特定语言中的发育、成熟、繁盛乃是该民族的学术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知道，德国人曾对马

①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②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33、49-50、52、72页。

丁·路德的《圣经》德译表示了无穷无尽的感谢，而黑格尔则盛赞在哲学上罕有建树的沃尔夫所作出的“不朽的贡献”：因为这位“德国人的教师”开始让哲学讲德语，从而使哲学成了普遍的、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①

这个简要的提示性说法比通常的想像具有深刻得多的内容。就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本质而言，根本不存在抽象的和无内容的“真理”，就像它根本不可能诉诸纯形式的或机械性质的“人工语言”一样。一种具有真正的生长力和自我主张的学术，只可能居留于特定民族之“活的语言”中。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力图表明：语言是对先行于一切反思态度的世界进行解释的模式。“一切思维都被限制在语言中，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可能性。”^②反之，当某种学术的语言脱离其自然生长的可能性而僵化时，就像它把理论形式化和抽象化为“坏的无限性”时，这总是意味着思想的倾颓，意味着这种学术已然进入其终结阶段了（大体类似于斯宾格勒所说的由“大地”转变为“石化的世界都市”）。进而言之，当我们说“让某种学术讲某种语言”时，决不是说只要一个民族用自己的母语来讲述或谈论某种学术，就标志着这种学术是自我主张的。海德格尔曾引述洪堡的观点说：一个民族有可能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使之完全变成另一种崭新的语言；换言之，它可能不改变语言的语音、形式和规律，而把崭新的东西赋予语言，使同一个外壳获得另一个意义。但这种转化的条件是：（1）内在澄明——即让存在自身显示出来；（2）外部境况的守护——即防止语言脱离其自然生长的可能性而僵化。^③事实上，在所谓“文化结合”的场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7、188页。

②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③ 参看《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2-53页。

合，这种转化不仅发生在一个民族的当代语言与它所继承下来的语言之间，而且也发生在这个民族的语言与另一民族的语言之间。唯当上述两个条件具备时，一种语言上以开新为定向的建设性转化才是可能的；而唯当这样的转化实际地开展出来之时，我们才能说，某种学术在特定语言中是发育成熟了；它现在属于这个民族，并成为其学术之自我主张的形式标志。

二

如果说，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从形式上来说必然是讲“中国语”的，那么，就内容方面而言，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之取得其自我主张的标志是：能够批判地脱离“主观思想”，特别是批判地脱离主观思想之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即“外部反思”。

“反思通常是以主观的意义被认为是判断力的运动。”^①用哲学的方式来说，外部反思表现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不知道如何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而仅仅知道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外部反思只是在“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脱离于作为现实性的内容本身，即“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Sache)”。^②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外部反思不仅从属于主观思想，而且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他很准确地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学者叫做“门外汉”。

外部反思并不是离我们遥远或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恰好相反，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中，非常普遍地流行着那种“仅仅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其主要表现无非就是通常被称作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先前的外部反思曾特别地借重过来自苏联的一般原则，那么，当今中国的学术则更多地从西方世界取得其抽象原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0-305页。

则，并把它们运用到——实则是先验地强加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盛行的状况，部分地起源于中国学界自近代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依赖或“学徒状态”，部分地植根于现代理智形而上学本身的抽象性质。就后者而言，这种形而上学意味着“反思的知性”占据了哲学，意味着一般的现代学术总体上只是立足于这种反思的知性之上。“在这个名词下，一般所了解的，是进行抽象的、因而是进行分离的知性，它在它的分离中僵化了。……理性限于只去认识主观的真理，只去认识现象，只去认识某种与事情本性不符的东西；知识降低为意见。”^①这个批判性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指明了外部反思的现代形而上学本质，从而也指明了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学术立足其上的哲学根据。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是有其重要性和意义的，它意味着学术成长的特定阶段以及对外学习的必要开展。同样，外部反思以及反思的知性也不是无谓的，它意味着理论思维的特定阶段，意味着通过主观性来建立形式的分解和抽象的普遍性等。然而，正像更加深入的哲学不可能滞留于反思的知性一样，中国学术的成长也不可能长久地满足于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当这种不满足充分地发展起来并被清楚地意识到时，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便会首先表现为与外部反思的批判性脱离。不仅如此，由于外部反思深深地植根于一般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由于这种形而上学甚至构成现代性学术的主要根据，所以，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还必须表现为与现代性学术之形而上学根据的批判性脱离。

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批判“反思哲学”(Reflexionsphilosophie)的意义，便突出地显现出来。“……黑格尔殚精竭虑同这种哲学斗争了一生，他曾用他的整个哲学方法、过程和具体总体、辩证法和历史与之相对抗。”^②这一斗争和对抗的实质是：作为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只是拘执于一般的抽象原则，而与现实的内容分离隔绝，所以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6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7页。

只是表现为纯粹空疏的理智；并且由于它仅仅从属于理智之抽象的同一性，所以最终完全是形式主义的。^① 约言之，外部反思是以一般的抽象原则阉割了内容，亦即遮蔽了作为内容本身的现实(wirklichkeit)。这里的真正要点是“现实”——它不是在知觉中能够被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因此在《逻辑学》中，“现实”的概念出现在“本质论”中)。^② 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使现实滞留于晦暗之中，而问题正在于揭示现实本身。伽达默尔曾就此写道：“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③

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无论是肯定性的联系还是否定性的联系——都是从这一根本之点发源的，亦即都是围绕着“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而开展出来的。正是通过对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全面批判，黑格尔把深入社会现实当作一项根本的哲学任务提示出来了。至于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卢卡奇和洛维特说得对，两者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④ 当黑格尔把现实的本质性置放在客观精神中，而客观精神又在为绝对精神的超越中找到其真正的哲学证明时，他是把现实本身神秘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现实固然意味着某种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意味着人们并不对之具有反思自由的境域，但其本质性却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因此，社会现实便被把握为具体化了的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被把握为在人们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变动结构。这意味着社会现实在新的存在论(ontology)基础上被重新开启：当黑格尔把所谓“现实”的内容最终转变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本质时，马克思将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2-144页；并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87-294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7-178页。

③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7页；参看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3-185、195-197页。

它导回到理性前的物质生活过程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深刻洞见都是从重新开启通达于社会现实的道路中起源的。1969年，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中，指证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强势掩盖，从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现实这个主题上的优越性和重要意义：现今的所谓“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完全误解了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①

由此可见，与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批判性脱离，必然意味着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一个具有实体性内容的领域，即“社会现实”的领域。如果说，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由摆脱其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肇其始端，那么，这种自我主张从根本上来说就不能不要求从外部反思的抽象主观性中解放出来，因而就不能不要求深入于社会现实本身的内容之中。换言之，只要社会现实（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还不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外部反思在学术中的垄断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而只要作为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依然盛行，则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就事情之总体的本质根据而言，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之取得其自我主张的决定性标志是：能够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之中，能够真正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主观思想—外部反思如何阻断了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从而使得思想上或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成为不可能。黑格尔曾多次论述拿破仑的伟大功业。他说，这位巨人打发掉一班舞文弄墨和只知道抽象原则的人，迅速解决掉法国内政的纠纷。不仅如此，他还征服了整个欧洲，使其开明的政制广为流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人在征战中表现过更大的天才，但“军事胜利”的无能为力，也没有比此时显现得更为清楚了。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拿破仑想要先验地把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结果他不

①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页。

可避免地失败了。^①由此可以大略比拟的是：拿破仑的这种想法本身只能是先验的主观思想；如果此时有一个西班牙的拿破仑主义者也持相同的想法，那么他只是在进行抽象的外部反思。而在这里被抹杀、被遗忘的乃是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是这一现实之全部实体性的内容。所以黑格尔的结论是：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②

由此而见，思想上或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根本不意味着什么可以任意进行“自由反思”的权利，这种浮薄庸浅的自由反思只能表明它自身的无头脑和无根基，表明它屈从于幻想、任意和武断。与“形式的意志”及“形式的自由”相反，真正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懂得哲学上的“客观性(sachlichkeit)告诫”，即事物有其自身的存在并在自身中活动，并不受主观反思过程的自由游戏的支配。^③因此，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自我主张，只是在主观任意的外部反思被彻底中止的地方，从而是在社会现实得到理解和把握的地方，才有可能现实地成长起来。

如果说，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要求着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那么，只有在这种自我主张开始起作用并具有积极效准的地方，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问题”)才可能被真正构成。海德格尔在对意识进行存在论的批判时说：重要的是做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如果从“我思”出发，那就根本无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1-423 页；并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91-292 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91 页。

③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1-72 页。